

发展研究专题

自由国际主义与冷战思维碰撞下的 发展问题研究：基于康奈尔— 秘鲁项目的案例

王迪

内容提要：冷战早期，在自由国际主义理念框架下，美国力图通过发展援助项目“改造”欠发达地区，与之相关的应用研究统御着美国社会科学。1949年，在美国基金会组织的资助下，康奈尔大学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系率先在美国西南部地区开展应用人类学研究，后将其渐次推广到其他“落后地区”。作为该计划的延伸，1952—1966年间，由人类学家艾伦·霍姆伯格积极推动的康奈尔—秘鲁项目在安第斯山区的维柯斯庄园启动实施。在此过程中，农业科学的引入、营养与健康计划的推进、印第安人教育的发展和社会组织的创建使地方社会经历了一定程度的变迁。然而，20世纪60年代初期，美国和平队的介入使这一人类学实验陷入冲突的漩涡，且逐渐失去科学研究的底色。1966年，美国基金会组织和相关援助机构先后完成资助，研究人员离开维柯斯。康奈尔—秘鲁项目研究表明，美国社会科学研究者以本国发展模式为蓝本制定的变迁计划因脱离拉美实际而“水土不服”，其秉承的自由国际主义本质上服务于冷战的政治目的。

关键词：康奈尔大学 秘鲁 自由国际主义 冷战 发展

作者简介：王迪，世界史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0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649 (2024) 01-0102-21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自由国际主义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性格”，它内在要求生成美国主导的全球变迁方案。^① 该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者秉承自由国际主义理念，对欠发达地区的贫困与落后问题展开研究，并试图将其成果转化为指导欠发达地区变迁的科学实践。在此背景下，人类学家艾伦·霍姆伯格推动实施了康奈尔—秘鲁项目。

20世纪40年代末期，康奈尔大学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系启动社会文化变迁研究，希冀通过“科学的引导”使欠发达地区顺利过渡到现代工业社会。康奈尔大学首先将关注点投向本国西南部地区的印第安人。有研究者认为，美国在工业、农业、医疗等领域取得的进步理应提升人们的生活水平，然而，印第安人却对现代科学技术持抵制的态度，这导致他们的生活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们在印第安人保留地展开田野调查，分析该地技术推广工作遭遇的阻力。^② 当这些研究者聚焦本土印第安人时，长期在拉美地区从事田野调查的人类学家艾伦·霍姆伯格则看到了农民暴动的危险，强调加速落后地区社会文化变迁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他看来，农民的贫困与落后将不可避免地引发暴力革命，应引入科学方法改造地方社会，使其平稳地踏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1951年11月，霍姆伯格推动康奈尔大学与秘鲁学术研究机构签署合作协议，在秘鲁内陆山区的维柯斯（Vicos）庄园启动名为“康奈尔—秘鲁项目”的人类学实验。^③

从以往的相关研究来看，学界已有专题著述，多从冷战史、国际关系史、外交史等角度探讨美国改造第三世界的路径问题。虽有多位学者考察了冷战时期美国向新兴民族国家推广的现代化理论，但对于人类学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着墨不多。^④ 有学者从宏观层面分析康奈尔大学主持推动的田野调查活动，但主要围绕美国西南部地区的印第安人保留地展开，没有对该项目的拓展情

① 牛可：《自由国际主义与第三世界——美国现代化理论兴起的历史透视》，载《美国研究》，2007年第1期。

② Wade Davies, “Cornell’s Field Seminar in Applied Anthropology: Social Scientists and American Indians in the Postwar Southwest”, in *Journal of the Southwest*, Vol. 43, No. 3, 2001, pp. 317–341.

③ 根据康奈尔大学的档案资料，康奈尔—秘鲁项目（Cornell–Peru Project）因主要在维柯斯庄园实施，故又称“维柯斯项目”（Vicos Project）。参见 Allan R. Holmberg Collection on Peru, Division of Rare and Manuscript Collections, Cornell University Library, Collection No. 14–25–1529.

④ [美] 雷迅马著，牛可译：《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挪] 文安立著，牛可等译：《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当代世界的形成》，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Irene L. Gendzier, *Managing Political Change: Social Scientists and the Third World*, Boulder and London: Westview Press, 1985.

况进行介绍。^① 有研究虽论及康奈尔—秘鲁项目，但重在分析美国军事情报部门与基金会组织在项目启动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对于身处“第三世界”的秘鲁缺乏足够的探讨。^② 鉴于此，本文在参考档案资料的基础上，考察康奈尔—秘鲁项目的缘起、实施的具体过程以及影响，阐明冷战早期美国人类学研究者秉承的自由国际主义未能摆脱冷战意识形态的桎梏，其“精心制定”的社会变迁计划也因脱离欠发达地区的现实而遭到挑战。

一 美国的自由国际主义与秘鲁的土著人问题

美国的自由国际主义滥觞于 20 世纪初，二战结束后对社会科学界产生重要影响。1918 年美国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提出“十四点”原则，设想在民族自决、自由贸易以及由国际联盟维护和平的基础上建立战后世界秩序，体现出彼时美国的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二战结束后，随着美国综合国力的增强，自由国际主义开始成为美国大战略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③ 该思想主张，在美国以外支持民主既是美国的道义责任，也是现实需要，美国的国家目标是“使民主在世界上安全存在”，为此必须介入和主导国际事务。^④ 在冷战从欧洲向东亚扩张的过程中，美国日益面临高度不确定的政治局势，苏维埃共产主义被视为对“自由世界”的主要威胁，意识形态斗争成为国际政治中的主旋律。在此背景下，美国社会科学家将专业研究与政策取向相结合，他们力图通过科学引导欠发达地区的社会变迁，使其顺利迈上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轨道。

在广大的欠发达地区，拉美对于美国来说具有重要的政治利益。早在 1823 年，门罗总统就针对“神圣同盟”企图干涉拉美独立革命的问题表明了立场，声称美国未曾干涉而且将来也不会干涉欧洲国家的殖民地或属地，同

^① Wade Davies, “Cornell’s Field Seminar in Applied Anthropology: Social Scientists and American Indians in the Postwar Southwest”, in *Journal of the Southwest*, Vol. 43, No. 3, 2001, pp. 317 – 341.

^② Eric B. Ross, “Vicos as Cold War Strategy: Anthropology, Peasants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in *Anthropology in Action*, Vol. 12, No. 3, 2005, pp. 21 – 33; Jason Pribilsky, “Development and the ‘Indian Problem’ in the Cold War Andes: ‘Indigenism’, Science, and Modernization in the Making of the Cornell – Peru Project at Vicos”, in *Diplomatic History*, Vol. 33, No. 3, 2009, pp. 405 – 426.

^③ 王栋、尹承志：《自由国际主义的兴衰与美国大战略》，载《外交评论》，2015 年第 1 期，第 88 页。

^④ 牛可：《自由国际主义与第三世界——美国现代化理论兴起的历史透视》，载《美国研究》，2007 年第 1 期，第 37 页。

样地，欧洲国家对西半球事务的干涉将被视为对美国“不友好的表现”。^①可见，美国很早就将拉美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不容许他国插手美洲事务。然而，彼时美国的资本主义才刚刚起步，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尚处于初级产品供应国的地位，其政治声音没有受到欧洲国家的重视。19世纪40年代中后期，美国先后通过政治和军事手段夺走墨西哥近一半的领土，以谈判的方式将原属于英国的俄勒冈地区划归己有。门罗总统主张的外交政策原则因在实践中的巨大威力而受到美国各政治派别的承认。进入20世纪，以英法为首的老牌殖民帝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被严重削弱，美国的国力则极大增强，拉美地区成为美国的重要投资地、原材料供应地和商品销售地，双方的政治经济联系达到前所未有的紧密程度。

当美国成为西方世界的“领头羊”时，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却日益凸显，潜伏已久的社会矛盾一触即发，底层人民的暴力革命成为独裁统治者挥之不去的梦魇。拉美与美国虽然同属西半球，甚至还经常以“邻居”相称，但它们在经济制度、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方面的差异性远远超过相似性。三个世纪的殖民统治使拉美的精英主义、威权主义、等级制度和世袭制度几乎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下来，并牢固地嵌入其文化传统和政治进程之中。^②尽管拉美国家与美国保持着密切的贸易往来，经济发展的红利却没有惠及底层民众，而是为地主寡头、商业精英和执政者所垄断。收入分配的不公和政治权利的不平等使寡头集团得以维持统治秩序，农民和工人则挣扎在贫困线的边缘。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知识分子、学生和工人阶级之间广泛传播，他们渴望实践革命导师马克思倡导的道路——暴力夺取政权、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以及更广泛的福利。在这种思想的熏陶下，苏维埃共产主义无疑对他们具有难以抵抗的吸引力，这使拉美国家的当权者寝食难安，也牵动着深受冷战逻辑影响的华盛顿决策者的神经。

艾伦·霍姆伯格是美国人类学家，受到自由国际主义和冷战时期意识形态斗争的双重影响。霍姆伯格曾长期在玻利维亚的安第斯山区从事田野调查，

^① 西班牙美洲殖民地革命是继北美独立战争后，美洲又一次反对欧洲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它破坏了1815年维也纳会议确立的封建王朝体系。因此，以神圣同盟为代表的欧洲反动势力企图对其进行武装干涉。参见Edward J. Renehan Jr., *The Monroe Doctrine: The Cornerstone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Chelsea House, 2007, pp. 5-10; 李庆余著：《美国崛起与大国地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91-102页。

^② Harvey F. Kline, Christine J. Wade, and Howard J. Wiarda,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17, pp. 15-18.

对该地区的土著人状况和社会革命问题保持密切关注。20 世纪 30 年代，玻利维亚在查科战争中失去大量领土，这激化了国内矛盾。曾参与军事战斗的土著农民不再甘于被孤立偏远的村落，开始要求改善政治经济状况并夺得国家权力。^① 在动荡的局势下，玻利维亚左翼力量进入政坛，组建了三大独立党派——左派革命党、托洛茨基派革命工人党和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1949 年，上述三大政党组成联盟，为农民起义提供政治支持，玻利维亚由此成为“拉美社会动员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② 1951 年，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领袖埃斯登索罗（Víctor Paz Estenssoro）参加总统竞选，获得民众的热情支持。然而，军方以反对共产主义威胁为由，阻拦埃斯登索罗的当选。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的成员反应激烈，他们缴获军械库的武器，向土著农民发放枪支，直至击溃军队力量，掌握政权。^③ 在玻利维亚革命的前夜，霍姆伯格正在围绕土著人展开田野调查，见证了土著农民的激进化程度和武装动员能力，对此怀有深切的忧虑。

20 世纪 40 年代末，霍姆伯格同时受聘于康奈尔大学和秘鲁国立圣马科斯大学，他随之将研究重心转向秘鲁，并试图将专业研究转化为有效实践。1949 年，霍姆伯格在国立圣马科斯大学民族学研究所的学生巴斯克斯（Mario C. Vázquez）的陪同下，对瓦伊拉斯省^④的维柯斯庄园进行了考察。^⑤ 关于维柯斯的最早档案记录显示，土著人酋长德科洛尼亚（Fernando de Colonia）于 1594 年以 300 索尔的价格从秘鲁总督手中购得维柯斯庄园，1607 年，其遗孀将庄园出售，德阿维拉（Alonzo de Avila）买入并将其捐赠给利马的圣安德鲁斯医院。1824 年，圣安德鲁斯医院被改造为利马公共慈善协会，协会负责人经营维柯斯庄园的地产，利用其收益维持协会的正常运转。这种情况一直持续至 20 世纪 30 年代。1933 年，秘鲁议会通过土地变更法案，由地方寡头操

^① E. Luis Antezana, “La Reforma Agraria Campesina en Bolivia (1956 – 1960)”, en *Revista Mexicana de Sociología*, Vol. 31, No. 2, 1969, p. 272.

^② [美] 托马斯·E. 斯基德莫尔、彼得·H. 史密斯、詹姆斯·N. 格林著，张森根、岳云霞译：《现代拉丁美洲》，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 年，第 193 页。

^③ Esteban Ticón Alejo, “La Revolución Boliviana de 1952 y los Pueblos Indígenas”, en *Temas Sociales*, No. 25, 2004, pp. 8 – 21.

^④ 瓦伊拉斯省（provincia de Huaylas）位于秘鲁北部的安卡什大区（departamento de Áncash），地势起伏较大，居民主要为土著人。

^⑤ William Mangin, “Thoughts on Twenty – Four Years of Work in Perú: The Vicos Project and Me”, in George M. Foster (ed.), *Long Term Field Research in Social Anthropolog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9, pp. 65 – 84.

纵的瓦拉斯公共慈善协会获得维柯斯庄园的所有权。^① 维柯斯虽几经转手，但庄园内土著农民的生活状况却鲜有改变，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沦为庄园的附属品，由庄园的所有者支配、管理甚至连带地转让。维柯斯庄园的情况给霍姆伯格留下深刻印象，使这位人类学家萌发了利用其专业知识引导土著生活变迁的初步想法。

经过对其他省份的土著农民的调查，霍姆伯格提出，秘鲁内陆山区的贫困与落后问题已经阻碍了国家的整体发展，只有消除贫困、整合土著人，才能缩小不同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为现代化道路注入新的活力。^② 他还将秘鲁土著人的境况与玻利维亚的农民起义联系起来，坚信同为安第斯国家，玻利维亚日益激进的意识形态和高度的社会动员势必对秘鲁产生示范性效应，而一旦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政党在安第斯山区建立据点，整个拉美都有滑向社会主义阵营的“危险”。^③

事实上，霍姆伯格的担忧不无道理。根据 1940 年秘鲁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近 2/3 的人口居住在内陆山区，他们从事与农业和畜牧业相关的生产活动，其生活环境缺乏电灯、饮用水、公路、通讯等基础设施。土地分配也非常不均，76% 的人口仅占有全国 0.5% 的土地，而绝大部分土地掌握在占人口比重极小的地主寡头手中。^④ 土著人作为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长期受到白人庄园主和梅斯蒂索监工的剥削，社会矛盾在农村地区缓慢发酵。不仅如此，秘鲁的种族矛盾十分尖锐。从殖民地时期开始，克里奥尔人和梅斯蒂索人就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受西方文化熏陶，土著人则居住在安第斯山区，保留了印加时期以村社为单位的集体劳动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使用区别于西班牙语的本土语言进行交流。在精英阶层看来，土著人的贫困、

^① Henry F. Dobyns, "The Struggle for Land in Peru: The Hacienda Vicos Case", in *Ethnohistory*, Vol. 13, No. 3, 1966, pp. 98-99.

^② Bureau of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U. 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The Vicos Experiment: A Study of the Impacts of the Cornell - Peru Project in a Highland Community*, Evaluation Special Study, No. 7, April 1982, p. 3.

^③ Enrique Mayer, "Vicos as a Model: A Retrospective", in Tom Greaves, Ralph Bolton, and Florencia Zapata, *Vicos and Beyond: A Half Century of Applying Anthropology in Peru*, Lanham: AltaMira Press, 2011, p. 164.

^④ Carlos Contreras y Marcos Cueto, *Historia del Perú Contemporáneo: Desde las Luchas por la Independencia hasta el Presente*, Lima: Instituto de Estudios Peruanos, 2007, pp. 274-280, pp. 334-335.

落后以及与城市主流社会的疏离构成了“土著人问题”^①，是秘鲁现代化道路上最大的阻力。

20 世纪 40 年代中期，由于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的上涨，地主寡头变本加厉地蚕食为土著村社集体所有的土地，这激发土著人展开各种形式的抵抗斗争。^②就在秘鲁政局陷入危机之际，以捍卫土著人权益和重新分配土地为主要纲领的左翼政党阿普拉党^③获得议会绝大多数席位。1947 年，秘鲁总统布斯塔曼特—里韦罗（Bustamante y Rivero）在阿普拉党的支持下签署了《亚纳科纳法》，规定佃农和地主之间必须签署租佃合同，明确合同有效期限，保障佃农的土地权益；禁止以低价强制收购农产品；废除庄园内的强制劳动等。^④这项法令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土著农民的利益，但也引起保守势力的强烈不满。次年，曼努埃尔·奥德里亚（Manuel A. Odría）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布斯塔曼特—里韦罗的统治。在此之后的 8 年，奥德里亚将军一方面实行高压政策，取缔阿普拉党，另一方面推出了整合土著人的诸多措施，试图解决土著人问题。^⑤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发现，肇始于 20 世纪初的自由国际主义随着冷战局势的发展而具有了新的内涵，它与美苏博弈背景下的意识形态斗争相互交织、纠缠。在这种情况下，引导欠发达地区的社会变迁并使其保持在资本主义轨道上是美国官方部门关切的重要问题。就秘鲁而言，其历史上形成的沿海与内陆二元发展格局严重束缚了国家的发展，底层民众的抗议活动此起彼伏，解决土著人问题迫在眉睫。就在此时，以霍姆伯格为首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提

① “土著人问题”由秘鲁知识分子在硝石战争结束后首次提出，他们将国家在战争中的惨败归咎于土著人，主张通过教育的方式同化和吸收这一边缘化族群。埃拉克利奥·博尼拉（Heraclio Bonilla）认为，“土著人问题”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政治话语，是因为克里奥尔统治精英对土著人暴动的恐惧。参见 Heraclio Bonilla, “Comunidades de Indígenas y Estado - nación en Perú”, en *Estudios Sociológicos*, Vol. 4, No. 12, 1986, pp. 429 - 443.

② Alberto Flores Galindo, “Movimientos Campesinos en el Perú: Balance y Esquema”, en *Cuaderno Rural*, No. 18, 1977, p. 7.

③ 阿普拉党（APRA, Alianza Popular Revolucionaria Americana）为音译，直译为“美洲人民革命联盟”，本文采用音译法。

④ José Matos Mar, *Yanaconaje y Reforma Agraria en el Perú: El Caso del Valle de Chancay*, Lima: Instituto de Estudios Peruanos, 1976, pp. 121 - 133.

⑤ Ricardo Melgar Bao, “Dictadura e Indigenismo Peruano: Producción de Estigmas y Prácticas Etnocidas (1948 - 1956)”, en *Pacarina de Sur* (En línea), Año 5, No. 19, abril - junio 2014.

出通过“社区发展”^①引导传统社会变迁的构想，美国基金会组织的资金支持和秘鲁相关研究机构的积极响应为其提供了将想法付诸实践的契机。

二 康奈尔—秘鲁项目的启动与实施

在美国推行自由国际主义外交战略的过程中，基金会组织通过国内资助促进知识生产。康奈尔—秘鲁项目的启动便与基金会组织具有密切关联。1947年，卡内基基金会决定为康奈尔大学的文化与应用科学工程提供资金支持，使该校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得以在泰国的邦灿（Bang Chan）、印度的塞纳普尔（Senapur）、秘鲁的维柯斯（Vicos）^②、加拿大的新斯科舍（Nova Scotia）和美国亚利桑那州的纳瓦霍族保留地（Navajo Reservation）展开社会文化变迁方面的比较研究。上述五个地区被认为具有一定的共同特点，即它们都处于贫困和落后的状态，蕴含着潜在的革命危险。^③

就秘鲁而言，霍姆伯格坚信改善土著人生活境况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其学术研究能够转化为改变落后地区社会生活面貌的实践效用。根据霍姆伯格的记录，维柯斯庄园位于安第斯山区瓦伊拉斯省的峡谷地带，在首都利马东北方向250千米处，总面积约有3500英亩（约合21246亩），地势起伏较大，海拔最高的地方可达4267米，主要用于放牧，海拔低的地方约有2743米，主要用于种植玉米、马铃薯、大豆、麦子等作物。庄园内约有1850名土著居民，95%的人只能讲克丘亚语，他们散居在海拔较低的地带。按照传统，每个家庭在形式上拥有一小块份地，为了获得对份地的使用权，家中的成年男性需每周为庄园主提供三天的义务劳动。除此之外，他们还会临时被叫去

^① 1915年，美国学者弗兰克·法林顿（Frank Farrington）首次提出“社区发展”的概念，指在政府部门的支持和指导下，充分发挥社区成员的积极性，利用社区自身力量和外部资源提高社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二战后，许多新兴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贫困、疾病、失业和经济发展缓慢的问题，借助社区加强社会整合和推动文化变迁的构想受到美国社会科学研究者的重视。参见 Bryan M. Phifer, “Community Development in America: A Brief History”, in *Sociological Practice*, Vol. 8, No. 1, 1990, pp. 18–31.

^② 卡内基基金会在1951—1956年、1959—1964年间为维柯斯的人类学实验提供资金支持。在项目启动之初，温纳—格伦基金会（Wenner-Gren Foundation）亦参与了对康奈尔—秘鲁项目的资助。参见 Deborah A. Wood, *Directed Cultural Change in Peru: A Guide to the Vicos Collection*,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Libraries, 1975, pp. v–vi.

^③ Jorge P. Osterling (ed.), “Notes for a History of Peruvian Social Anthropology, 1940–1980”, in *Current Anthropology*, Vol. 24, No. 3, 1983, p. 345.

充当厨师、佣人、马夫和看守，其牲畜也理应为庄园主无偿使用。如果土著人没有履行上述职责，庄园主及其监工有权剥夺他们的生产工具、牲畜和仅有的小块份地，亦可以实施鞭笞、监禁等惩罚措施。在霍姆伯格看来，维柯斯庄园从殖民地时期到康奈尔—秘鲁项目启动之前，几乎没有经历过变化，所谓“现代生活方式”更与这里格格不入。^①

基于1949—1951年间对维柯斯庄园及其所属的安卡什大区的田野调查，霍姆伯格认为庄园中土著人的状况已经达到非常糟糕的程度，如果不实施有效的干预以改善他们的生活，他们极有可能通过“更为血腥的革命”表达不满，在剧痛中艰难地适应现代社会。^②在这种顾虑下，霍姆伯格形成了通过引进现代科学技术引导传统社会变迁的设想。按照该设想，传统社会的变迁应该得到科学指导且能够加以控制，在适当的鼓励与支持下，土著农民将实现从消极无助的被剥削者到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参与者的转变。^③1951年中期，霍姆伯格赴利马参加秘鲁土著研究所组织的学术研讨活动，他借此机会详细地阐述了关于有指导的社会变迁的构想，得到了秘鲁土著研究所所长卡洛斯·蒙赫·梅德拉诺（Carlos Monge Medrano）和教育部部长路易斯·E. 巴尔卡塞尔（Luis E. Valcúrcel）的热情支持。^④同年11月，霍姆伯格和卡洛斯·蒙赫·梅德拉诺分别代表康奈尔大学和秘鲁土著研究所签署了在维柯斯庄园开展应用人类学研究的合作协议。根据该协议，康奈尔大学为项目的启动和实施提供资金支持，秘鲁土著研究所所有义务向研究者提供必备的物资并帮助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⑤

^① Allan R. Holmberg, “Changing Community Attitudes and Values in Peru: A Case Study in Guided Change”, in Richard N. Adams (ed.), *Social Change in Latin America Today: Its Implications for United States Polic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0, pp. 78–80.

^② Eirc B. Ross, “Reflections on Vicos: Anthropology, the Cold War and the Idea of Peasant Conservatism”, in Tom Greaves, Ralph Bolton, and Florencia Zapata, *Vicos and Beyond: A Half Century of Applying Anthropology in Peru*, Lanham: AltaMira Press, 2011, p. 139.

^③ Mario C. Vázquez, “Changes in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an Andean Hacienda”, in Dwight B. Heath and Richard N. Adams, *Contemporary Cultures and Societies of Latin America*, New York: Random House, pp. 405–423.

^④ Jason Pribilsky, “Development and the ‘Indian Problem’ in the Cold War Andes: ‘Indigenism’, Science, and Modernization in the Making of the Cornell–Peru Project at Vicos”, in *Diplomatic History*, Vol. 33, No. 3, 2009, p. 416.

^⑤ Osmar Gonzales, “El Instituto Indigenista Peruano: Una Historia por Conocer”, en Laura Giraudo (ed.), *La Ambivalente Historia del Indigenismo: Campo Interamericano y Trayectorias Nacionales, 1940–1970*, Lima: Instituto de Estudios Peruanos, 2011, pp. 148–151.

为了顺利实施霍姆伯格的变迁计划，研究者首先要获得对维柯斯庄园的支配权。从霍姆伯格和巴斯克斯的前期调查可知，维柯斯庄园从1933年开始为瓦拉斯公共慈善协会所有，协会成员利用庄园的收益来支撑公立医院的运转。通常情况下，瓦拉斯公共慈善协会的负责人并不亲自经营庄园，他们将其在社会上公开竞拍，出价最高者获得对庄园为期十年的使用权限。1946年，地方商人马西亚斯（Ignacio Macias）竞得维柯斯，将其作为亚麻工厂的原料来源地和劳动力供应地。然而，亚麻工厂经营不善，到1951年已濒临倒闭，这促使马西亚斯急于将庄园转手出去。在这种情况下，康奈尔大学和秘鲁土著研究所在地方政府部门的积极协调下，成功获得了维柯斯庄园的使用权。^①

1952年1月1日，康奈尔—秘鲁项目正式启动，霍姆伯格成为名义上的“新庄园主”，享有对维柯斯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决定权。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霍姆伯格提出有指导的变迁集中在四个领域，即经济与技术、营养与健康、教育和社会组织。研究者认为，农业生产水平低下是维柯斯最突出的问题。一般而言，土著人向庄园主提供的劳动和服务不会得到经济回报，反而经常遭到监工的鞭笞和责骂。在没有尊严的工作环境和缺乏奖励刺激的情况下，土著人宁愿选择得过且过。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他们在自己的家庭份地苦心经营，仔细观察作物的长势和牲畜的状况，为了能够得到丰硕的产出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摸清这一情况后，霍姆伯格宣布废除庄园内的义务劳动，代之以薪资劳动，调动土著农民的生产积极性。^②

在“解放”土著人的基础上，霍姆伯格试图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维柯斯庄园的农业发展注入动能。项目启动之前，维柯斯的农业生产已经因土壤贫瘠、种子质量退化和耕种方法不当等问题陷入危机。庄园内最主要的农作物马铃薯受到枯萎病的侵扰，这直接导致马铃薯的产量连年下降，土著人不得不忍受食物短缺。研究者向美洲粮食生产合作组织寻求帮助，他们从技术专家那里得知，马铃薯的枯萎病不仅可以被有效控制，还能通过科学的干预提高产量。这一消息使康奈尔—秘鲁项目的研究者振奋不已，但土著农

^① Bureau of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U. 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The Vicos Experiment: A Study of the Impacts of the Cornell - Peru Project in a Highland Community*, Evaluation Special Study, No. 7, April 1982, pp. 7 - 20.

^② Allan R. Holmberg, "Changing Community Attitudes and Values in Peru: A Case Study in Guided Change", in Richard N. Adams (ed.), *Social Change in Latin America Today: Its Implications for United States Polic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0, p. 85.

民却对此表示怀疑。有些土著人虽然希望得到技术专家的帮助，但他们没有经济实力承担购买种子和化肥的费用。面对这一问题，霍姆伯格制定了“共享种植计划”，由康奈尔—秘鲁项目的工作人员提供优良的马铃薯品种、化学肥料、杀虫剂和除草剂，并辅之以专业的种植建议，土著农民提供土地和生产工具，先行完成马铃薯的种植和培育工作。等待收获时节，土著人再将马铃薯产量的一部分交还给工作人员，以抵偿前期的资本投入。整个过程引入信用机制，每个土著人的个人信用都发挥重要作用。^①

推广新的马铃薯品种和种植技术并非易事。在推行社会变迁计划的第一年，363 户家庭中仅有 17 个家庭加入该计划，1953 年数量有所增多，达到 87 户。到项目结束时，共有 262 户家庭参与过“共享种植计划”，没有加入过该计划的家庭通常根据自己的需要购买种子和肥料，逐渐采用新的马铃薯品种和种植方法。^② 根据史蒂文斯（Robert Stevens）提供的数据，实施“共享种植计划”的第一年，马铃薯试验田的产量就增加了一倍，到 1954 年维柯斯已经是瓦伊拉斯省的第二大马铃薯生产地。^③ 除了“共享种植计划”之外，研究者帮助维柯斯居民引进优良的奶牛品种、制定家禽疾病预防计划、加强牧场管理，注重植树造林、改进梯田和灌溉系统、建立示范性菜园，鼓励他们通过直接贷款的方式获得从事农牧业活动的启动资金。^④

维柯斯居民的营养与健康问题是康奈尔—秘鲁项目的研究者关注的又一重要领域。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系做过一项关于秘鲁居民的膳食调查，其中包含维柯斯的记录。该调查的重要参与者奇里沃加（Carlos Chiriboga）在记录中提到，“维柯斯的土著人平均每天摄入 1500 卡路里，该数量仅占维持身体健康所需卡路里的 70%。……钙和维生素 A 的摄

① Allan R. Holmberg, “Changing Community Attitudes and Values in Peru: A Case Study in Guided Change”, in Richard N. Adams (ed.), *Social Change in Latin America Today: Its Implications for United States Polic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0, p. 86.

② Mario C. Vásquez, “The Interplay between Power and Wealth”, in Henry F. Dobyns, Paul L. Doughty, and Harold D. Lasswell, *Peasants, Power and Applied Social Change: Vicos as a Model*,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1964, pp. 65 – 87.

③ Robert Steven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on Hacienda Vicos*,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4, pp. 13 – 19.

④ Bureau of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U. 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The Vicos Experiment: A Study of the Impacts of the Cornell – Peru Project in a Highland Community*, Evaluation Special Study, No. 7, April 1982, pp. 7 – 20.

入量严重不足，完全无法达到营养标准”^①。巴斯克斯对维柯斯居民的饮食情况也有一定的记录。他们在每年的5—7月往往享有种类丰富的食物，在11月至次年1月则需要忍受饥饿，这直接地影响了土著人的健康状况。绝大部分土著家庭都饲养一定的牲畜，但很少将其宰杀食用，这导致土著人的蛋白质摄入量偏低，损害了身体机能。另有研究表明，维柯斯居民普遍受到感染寄生虫的困扰，麻疹和百日咳时常夺去幼儿的生命。情况更为糟糕的是，庄园内几乎没有医疗卫生设施，当地居民生病时只是求助于传统的经验方法，对现代西方医学知之甚少，更不会到市镇医院寻求帮助。^②

针对维柯斯居民在营养与健康方面的问题，康奈尔—秘鲁项目的研究者采取多方面的措施。首先，他们在庄园中建立简易的医疗救护站，向居民普及基本的公共卫生知识，宣传病菌理论，使其树立对疾病的预防意识。其次，研究者根据对维柯斯居民营养状况的监测结果，制定合理的膳食计划，为儿童和孕妇提供奶粉，保证营养供应。最后，研究者推动建设维柯斯的医疗服务设施。1954年6月，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秘鲁公共卫生与社会救助部的联合支持下，医护团队每两周在维柯斯开设一次门诊，为居民提供诊疗服务。20世纪50年代末期，门诊为居民接种百日咳疫苗，在改善土著儿童健康方面起到了良好效果。进入20世纪60年代，维柯斯居民开始接纳现代西方医学，他们能够主动到城市中的医院就诊，逐渐打破了长久以来被困在庄园之中的藩篱。^③

教育是霍姆伯格有指导的社会变迁计划的核心领域，也被秘鲁土著研究所视为整合土著人的有效手段，受到合作双方的极大重视。1940年，地方政府根据教育部的相关规定，在维柯斯建立了第一所学校。学校只有一名授课教师，登记注册的学生有20人，但每天的实际出勤人数仅为10人。从名义上讲，学校为男女混合制，但报名上学的全部为男生，尚未有女生接受过学

^① Carlos Collazos Chiriboga, “Dietary Surveys in Peru III: Chacón and Vicos, Rural Communities in the Peruvian Andes”, i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Dietetic Association*, Vol. 30, No. 12, 1954, pp. 1222 – 1230.

^② L. E. H. Payne, Gonzáles – Mugaburu, and E. M. Schleicher, “An Intestinal Parasite Survey in the High Cordilleras of Peru. I.”, i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Tropical Medicine and Hygiene*, Vol. 5, No. 4, 1956, pp. 696 – 698.

^③ Bureau of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U. 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The Vicos Experiment: A Study of the Impacts of the Cornell – Peru Project in a Highland Community*, Evaluation Special Study, No. 7, April 1982, pp. 41 – 44.

校教育。^① 霍姆伯格和多宾斯在《加速社区变迁的进程》中说，“在这所学校运行的11年时间里，维柯斯人没有掌握读写能力，教师只是一个非常轻松的虚职”。^② 康奈尔—秘鲁项目的研究者致力于改变土著人在社会中的被动地位，他们认为有必要重视和发展土著人教育，清除土著人与克里奥尔人和梅斯蒂索人之间的语言障碍，加强与外部世界的融合。

项目启动之初，土著农民并不信任霍姆伯格，更不相信他能为土著人创造接受教育的机会。1953年7月，在秘鲁劳动与土著事务部的支持下，维柯斯建成了第一所由教室、办公室和图书馆组成的新式学校。康奈尔—秘鲁项目的工作人员采购了桌椅、黑板、粉笔等基本教学设施。为了动员土著人将子女送到学校接受教育，霍姆伯格推出免费的营养午餐计划，面向学生家长宣传教育的重要性。这些行动促使学校的入学人数从最初的10人迅速增加到60人。学校还多次组织课外活动，带领学生参观附近地区的梅斯蒂索学校和刚修建好的瓦兰卡水电站，渐渐地打开了学生的视野，也激发了他们的求知欲和对世界的好奇心。1954年，霍姆伯格同教师、学生家长和土著人领袖共同决定建立第二所更加现代化的学校，其中包括教室、餐厅、礼堂和商店，为学生配备体育运动设施。1957年，该学校被改组为更大规模的农民教学中心，用来为维柯斯及其附近地区的土著人提供免费的西班牙语培训和普及农牧业方面的科学知识。到1963年，维柯斯学校的学生多达200余人，能使用西班牙语的土著居民从最初的23人增至279人，另有学生在完成基础教育后到城市继续接受中等教育，这为他们改变个人命运打下了基础。^③

在推进有指导的社会变迁计划的过程中，如何培养维柯斯居民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是霍姆伯格密切关注的问题。1952年，地方政府部门的干预和协调使维柯斯庄园被转让到霍姆伯格手中，相关的变迁计划得以展开。在土著居民看来，霍姆伯格是“新庄园主”，天然地享有对庄园事务的决定权，因此与霍姆伯格保持着疏离的关系。为了打破“一言堂”的局面，康奈尔—秘鲁项目的研究者邀请庄园中德高望重的长者和思想先进的青年一同讨论经济和社

^① Bureau of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U. 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The Vicos Experiment: A Study of the Impacts of the Cornell - Peru Project in a Highland Community*, Evaluation Special Study, No. 7, April 1982, p. 37.

^② Allan R. Holmberg and Henry F. Dobyns, “The Process of Accelerating Community Change”, in *Human Organization*, Vol. 21, No. 2, 1962, pp. 107 - 109.

^③ J. Oscar Aler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a Peruvian Community”, in *Journal of Inter - American Studies*, Vol. 7, No. 4, 1965, pp. 423 - 448.

会事务，每周二晚上与他们集会，听取其关于维柯斯发展的建议。通常情况下，研究人员对这些参与者提出的看法予以认真的考虑和积极的支持，有意识地培养他们的领导能力，渐渐地使他们在处理庄园事务时发挥主导性作用。1957年，霍姆伯格将决策权移交给维柯斯居民选举产生的领导集体，他们由退伍的老兵和到沿海发达地区闯荡过的年轻人组成，普遍掌握西班牙语、具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和相对开阔的眼界，被认为能够带领维柯斯居民在发展的道路上继续向前迈进。^①

毋庸讳言，霍姆伯格精心设计了针对维柯斯的社会变迁计划，他坚信自己的专业研究能够转化为科学实践。面对历史以来的贫困问题，霍姆伯格主张引进优良的马铃薯品种和先进的种植技术，在专业化生产的基础上促进原始资本的积累。为了改善土著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康奈尔—秘鲁项目的研究者一方面积极宣传公共卫生知识，另一方面推动建立基本医疗服务体系，推进关于百日咳等疾病的预防工作。在教育领域，项目实施期间两所学校先后在维柯斯建立，学生入学率得到极大提高，免费的西班牙语培训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土著人在社会中的被动处境。从社会组织层面来看，地方领导集体在庄园事务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使霍姆伯格从“庄园主”转变为“观察者”和“咨询者”。在康奈尔—秘鲁项目实施的最初十年，传统的维柯斯庄园的确经历了显著的变迁。然而，进入20世纪60年代，这一精心策划的人类学实验项目将面临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巨大挑战。

三 美国和平队的介入和维柯斯庄园的内部冲突

20世纪50年代末期，拉美地区的政治局势发生剧烈变化，美国的自由国际主义再次发挥作用。1959年1月，由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起义军占领哈瓦那，推翻了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的专制统治，古巴革命取得胜利。同年3月，古巴政府宣布对美国国际电报电话公司的子公司古巴电话公司实行国有化，该举措拉开了古巴经济改革的序幕。此后，古巴政府颁布《土地改革法》，禁止外国人占有古巴土地，终结外国资本土地所有制。^②面

^① Allan R. Holmberg, “Changing Community Attitudes and Values in Peru: A Case Study in Guided Change”, in Richard N. Adams (ed.), *Social Change in Latin America Today: Its Implications for United States Polic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0, pp. 87–88.

^② 王晓德著：《美国文化与外交》，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378–379页。

对发生在“近邻”的激烈社会变革，时任美国国务卿赫特（Christian Herter）在政策备忘录中强调推翻卡斯特罗的重要理由：“卡斯特罗将不愿意采取与华盛顿最低安全需要和政策利益相一致的政策与态度”，卡斯特罗政权的长期存在不可避免地损害美国在拉美的特殊利益，同时也滋生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温床。^① 1961年4月，初掌政权的肯尼迪总统批准执行企图武装颠覆卡斯特罗政权的吉隆滩登陆计划。这支受到中央情报局训练的流亡部队遭到早有准备的古巴军队的抵抗，在两天的时间内被迅速击溃。从此，美国落下了企图武装干涉拉美国家内政的口实，美拉关系降到冰点。

为了扭转美国的负面形象和防止第二个古巴的出现，肯尼迪政府调整对拉美政策，从政治和军事领域的直接干预转向重视拉美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1961年8月，在乌拉圭召开的泛美经济与社会理事会部长级会议通过了《告美洲各国人民书》和《埃斯特角宪章》，宣告成立“争取进步联盟”。该联盟有两个主要目标，即实行代议制民主和促进拉美社会经济发展。美国承诺在10年的时间里向拉美提供200亿的援助资金，拉美国家则需要制定各自的发展计划和进行必要的社会变革，推进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保证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不低于2.5%。^② 争取进步联盟是美国反共政策在新形势下的“翻版”，它一方面追求拉美政局稳定的战略目标，另一方面又要求拉美各国实施社会经济改革，两者之间包含着难以调和的矛盾。那些在敌视和孤立古巴方面坚定地和美国站在一起的拉美政府，绝大多数是右翼独裁政府，它们害怕失去政权，拒绝进行社会变革。因此，争取进步联盟未能成功助推拉美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美国利用该联盟缓和美拉关系的目标没有实现。

1962年，肯尼迪政府酝酿已久的又一重要计划——“和平队”问世。依照肯尼迪的设想，和平队志愿者将在海外度过两年，与他们所服务的穷人过着同样艰苦的生活。他们来自美国的各个领域，都心甘情愿地牺牲在富裕社会里的舒适生活，通过他们的勤勉劳动和掌握的先进技术帮助有需要的人，从而在美国人民与第三世界的民众之间架设友谊的桥梁。肯尼迪的谋士们相信，在美国军事顾问训练外国士兵、传授击败共产主义的战斗技巧的地方，

^① Alex R. Hybel, *How Leaders Reason: US Intervention in the Caribbean Basin and Latin America*,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0, pp. 87-88.

^② 李春辉等主编：《拉丁美洲史稿·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72页。

志愿者的人道主义行为和民主价值观将展现美国社会的美德。^①然而，和平队从来都没有真正地成为“战争的道德对等物”，无论是筹建和平队的美国政策部门还是志愿者本身，都不自觉地将美国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制度作为参照点，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改造他们心中的“贫困社会”。这种对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先入之见不可避免地体现到志愿者的行动中，从而在地方社会造成冲突。在秘鲁的维柯斯庄园，和平队的举动清晰地体现了这一点。

和平队计划刚推出不久，与美国保持密切联系的秘鲁总统普拉多—乌加特什（Manuel Prado y Ugarteche）就提出请求，希望美国能够派遣和平队援助秘鲁。1962年7月，里卡多·戈多伊（Ricardo Godoy）将军推翻普拉多政府，开始军政府统治。因政局变动的影 响，由68名志愿者组成的首批和平队于1962年9月8日抵达秘鲁，他们加入秘鲁政府推出的“土著人口国家整合计划”，被赋予帮助土著人融入社会的强烈期望。

在这68名和平队志愿者中，有15人被派往维柯斯，直接参与康奈尔—秘鲁项目，由该项目的另一位重要参与者威廉·曼金（William Mangin）管辖。彼时，霍姆伯格已经“退居幕后”，仅负责统筹和协调方面的工作。^②这群刚走出大学校门的青年带着狂妄自大的心态来到维柯斯，对这里的居民缺乏足够的尊重，使原本平静的维柯斯陷入冲突。曼金在回忆录中提到，一位毕业于美国顶尖学府的和平队志愿者兴致勃勃地向土著居民展示新的动物阉割方法。这位学生向土著人的驴子开刀，但因为操作不当而直接杀死了它，引起土著人的强烈不满。还有学生在驾驶和平队的车辆时撞伤行人，因没有及时妥善地处理好这起意外事故，和平队在地方居民当中树立起负面形象。^③在一定程度上，和平队志愿者的到来破坏了康奈尔—秘鲁项目的研究者与维柯斯居民之间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他们本身也没有起到传播“人道主义精神”和展现美国“自由民主价值观”的作用，曼金对此心存隐忧。

1963年，和平队志愿者的大胆行动触碰了维柯斯居民的底线，双方矛盾迅速激化，康奈尔—秘鲁项目也受到牵连。在维柯斯附近，有一个紧邻幽静

^① [美] 雷迅马著，牛可译：《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171-175页。

^② William Mangin, “Early Years of the Vicos Proje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Sympathetic Participant Observer”, in Tom Greaves, Ralph Bolton, and Florencia Zapata, *Vicos and Beyond: A Half Century of Applying Anthropology in Peru*, Lanham: AltaMira Press, 2011, p. 34.

^③ 转引自 Charles C. Jones, *The Peace Corps: An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Problems, Preliminary Evaluation, and Future*, PhD Dissertation, West Virginia University, 1967, p. 197.

峡谷的钱柯斯庄园（Chancos），庄园内有一家破旧的旅馆和天然的温泉，被和平队志愿者视为发展旅游业的绝佳选地。维柯斯居民对扩大庄园面积有一定兴趣，但没有将发展旅游行业纳入考量范围。以罗伯特·罗伯茨为代表的和平队则看重钱柯斯庄园的旅游发展潜力，他们私自以维柯斯居民代表的身份与瓦拉斯公共慈善协会的负责人接洽，希望可以转让钱柯斯庄园。同时，这一想法得到和平队在秘鲁的主管曼凯维奇（Frank Mankiewicz）的支持，他帮助和平队从美洲银行和奥廷格基金会获得12000美元的贷款。此后，和平队伪造维柯斯庄园负责人的签名，以维柯斯的土地为抵押，完成了转让。根据和平队与瓦拉斯公共慈善协会之间的协议，维柯斯居民获得钱柯斯50公顷（合750亩）的土地，但他们需要在五年的时间里对庄园内的旅馆进行翻修或者重建，完成饭店、蒸气浴室和游泳池等配套设施的建设工作；转让后的第四年和第五年，钱柯斯旅游业收入的10%应上缴给瓦拉斯公共慈善协会，五年期满后该协会恢复对钱柯斯庄园的所有权。^①

和平队志愿者的“暗箱操作”没有使他们如愿。艾达·米利亚（Aida Milla）是秘鲁“土著人口国家整合计划”的工作人员，与维柯斯居民沟通和接触十分频繁，对当地情况颇为了解。当她得知相关转让活动时，坚持要求和平队志愿者出示签订的转让协议。她从协议中发现维柯斯的土地已经被抵押，且需要承担钱柯斯庄园的旅游开发工作。维柯斯的土著人虽然希望扩大庄园的土地面积，但从没有想过需要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对土著农民来说，土地对他们具有重要意义，是其维系生存的根基和命脉。艾达将转让协议的内容公之于众，维柯斯的土著居民强烈要求废除这项协议，驱逐和平队志愿者。但这些志愿者固执己见，要求美国官方部门给予保护和支持，双方僵持不下。部分激愤的土著人在维柯斯庄园的小广场聚集起来，高喊“杀死外国佬”，引来了维持秩序的警察。^② 康奈尔—秘鲁项目的参与者曼金和道蒂（Paul Doughty）试图平息事态，避免武装冲突，他们与秘鲁“土著人口国家整合计划”的负责人佩莱格林·罗曼·温苏埃塔（Pelegrín Román Unzueta）

^① Glenn Francis Sheffield, *Peru and Peace Corps, 1962-1968*,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1991, pp. 300-319.

^② William Mangin, “Early Years of the Vicos Proje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Sympathetic Participant Observer”, in Tom Greaves, Ralph Bolton, and Florencia Zapata, *Vicos and Beyond: A Half Century of Applying Anthropology in Peru*, Lanham: AltaMira Press, 2011, pp. 35-36.

协调，最终将和平队志愿者调离维柯斯。^①在这次冲突事件中，康奈尔—秘鲁项目的部分研究者也卷入其中，这使该项目蒙上了一层阴影。1966年，美国基金会组织和相关援助机构先后完成资助，相关研究人员离开维柯斯。^②

值得关注的是，脱离外界干预的维柯斯到底能走多远？以美国社会为模板设计出来的变迁计划能否解决秘鲁的土著人问题？要对此做出回答，需将康奈尔—秘鲁项目置入冷战的历史背景和秘鲁的国内现实加以分析和考察。

四 美国的冷战意识形态与秘鲁的国内现实

霍姆伯格是深受自由国际主义影响的美国社会科学研究者之一，其学术研究没有脱离冷战时期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题。他推动实施的社会变迁计划以美国的社会发展经验和现代化进程为蓝本，包含着理论与现实方面的双重功用。从理论上讲，霍姆伯格认为美国凭借先进的科学技术，在经历工业化、城市化和民主化之后，已经达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至高点，其经验能够为欠发达国家提供借鉴，帮助它们在美国式的道路上取得进步。为此，他针对维柯斯的情况制定了在农业、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组织方面的变迁计划，试图通过康奈尔—秘鲁项目来验证美国发展道路的有效性和普遍性。在现实层面上，拉美地区作为美国的“近邻”，从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角度考虑，理应将其保持在美国设定的轨道上。这种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斗争使身为社会科学研究者的霍姆伯格将专业知识与“爱国主义情怀”相结合，通过向“落后地区”输入一整套社会变迁的行动方案，以实现抵制革命潮流涌入的政治目标。

然而，霍姆伯格对维柯斯庄园的分析从一开始便是有失偏颇的。在提交给卡内基基金会的研究计划中，他认为维柯斯的土著人处于孤立和隔绝的状态，是长期受到庄园主和监工压迫的封建农奴，生活水平极其低下，因此需

^① Glenn Francis Sheffield, *Peru and Peace Corps, 1962-1968*,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1991, pp. 313-316.

^② 卡内基基金会对康奈尔—秘鲁项目的资助于1964年到期，美国国际开发署对该项目的资助从1963年开始，到1966年结束。参见 Allan R. Holmberg Collection on Peru, Division of Rare and Manuscript Collections, Cornell University Library, Collection No. 14-25-1529, p. vi.

要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拯救”土著人，帮助他们获得民主和自由。^①事实上，在现代化发展的大潮中，即便是偏远的维柯斯也具有多重面向，但霍姆伯格只看到了其中的一面。弗里德（Jacob Fried）的研究表明，维柯斯与外部世界具有紧密的联系。土著农民经常作为季节性劳工到沿海地区谋求工作机会，用劳动工资补贴家用，庄园主则根据区域市场的需要和农作物的价格涨落来调整经济活动。对于普通的家庭来说，他们为了获得自己无法生产的盐、糖、酒、煤油等生活必需品，同样要参与到市场活动中，活跃的货币经济始终在维柯斯发挥着重要作用。^②面对庄园主和监工的不公正对待，土著农民通过参加地方抗议活动捍卫自己的权益，1925年来自维柯斯的土著人代表甚至受到秘鲁总统莱吉亚（Augusto B. Leguía）的接见。^③在康奈尔—秘鲁项目启动之前，维柯斯已经存在了较为明显的阶级分层，部分家庭拥有更多的土地和牲畜，以向贫困佃户提供借贷的方式过上了相对富足的生活。^④霍姆伯格没有看到这种多元图景，而是坚信土著人是完全孤立、贫困和无助的，迫切需要美国的帮助，这种认知上的偏狭使康奈尔—秘鲁项目从启动之初就脱离了秘鲁的社会现实。

对维柯斯的绝大部分土著人来说，他们最大的诉求是获得土地，但霍姆伯格没有正视这一诉求。他推崇的农业专业化生产要求大面积的土地，很多贫困的家庭只拥有极少的份地，无法承担购买种子、化肥、杀虫剂所需的高昂费用。相反，原本富有的农户以马铃薯规模化种植为契机，加速了土地兼并的进程。^⑤1962年，维柯斯居民在康内尔—秘鲁项目的研究者和美国驻秘

① William P. Mitchell, “Anthropological Hope and Social Reality: Cornell’s Vicos Project Reexamined”, in Tom Greaves, Ralph Bolton, and Florencia Zapata, *Vicos and Beyond: A Half Century of Applying Anthropology in Peru*, Lanham: AltaMira Press, 2011, pp. 81–101.

② Jacob Fried,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Personal Security in a Peruvian Hacienda Indian Community: Vicos”, i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 64, No. 4, 1962, pp. 771–780.

③ James R. Himes, “The Impact of Peru in the Vicos Project”, in *Research in Economic Anthropology*, No. 4, 1981, pp. 141–213.

④ Mario C. Vásquez, “The Interplay between Power and Wealth”, in Henry F. Dobyns, Paul L. Doughty, and Harold D. Lasswell, *Peasants, Power and Applied Social Change: Vicos as a Model*,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1964, pp. 65–87.

⑤ Bureau of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U. 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The Vicos Experiment: A Study of the Impacts of the Cornell – Peru Project in a Highland Community*, Evaluation Special Study, No. 7, April 1982, pp. 93–96.

鲁大使馆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获得了对庄园的集体所有权。^① 在外界看来，维柯斯经历了历史性的转变，土著人成为了这片土地上真正的主人。^② 但实际上，对土地的经营权和决定权始终由庄园内一小撮精英把持，他们借此机会进一步扩张自身利益，窘迫的家庭则不可避免地走向破产，沦为无地的佃农，其内部的经济和社会不平等进一步加剧。20世纪60年代中期，马铃薯病虫害在庄园内肆虐，以专业化种植为主要竞争优势的维柯斯遭遇危机。由于没有找到有效的防治办法，且康奈尔—秘鲁项目的研究人员撤出了维柯斯，土著农民不得不回归最初的种植方式。^③

整体来看，无论是康奈尔—秘鲁项目的推动者霍姆伯格，还是后来加入其中的和平队志愿者，都受到自由国际主义和冷战思维的双重影响。只不过，霍姆伯格受自由国际主义影响更深，他坚信人类学研究的科学效用，并通过多方协调推进了该项目。与之相对，和平队志愿者更多地受冷战意识形态驱动，他们急于展现美国的先进技术和发展理念，且完全忽视了秘鲁地方社会的现实。

该项目之所以能在秘鲁实施，亦离不开该国特定的历史背景。20世纪中期，得益于现代医学的发展，秘鲁主要的传染性疾病得到有效的控制，人口迅猛增长。然而，农村地区有限的土地资源无法承载庞大的人口压力，加之秘鲁政府轻视农业的经济发展政策，致使陷入生活困境的土著农民不得不发起抗议运动。有指导的社会变迁计划因满足了政治精英的需要而得以付诸实施，但在此过程中却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20世纪60年代初期，维

① 在康奈尔—秘鲁项目研究人员的积极推动下，美国驻秘鲁大使詹姆斯·I·勒布（James I. Loeb）和政治家爱德华·肯尼迪（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的兄弟）在1961年中期先后到访维柯斯，了解到土著人因土地转让价格被一再抬高而陷入困境。随后，爱德华·肯尼迪以经济援助为筹码就维柯斯庄园一事向秘鲁总统普拉多—乌加特什（Manuel Prado Ugarteche）施加压力，促成维柯斯庄园最终以200万比索的价格成功转让给土著农民手中。参见 Allan R. Holmberg, “The Role of Power in Changing Values and Institutions of Vicos”, in Henry F. Dobyns, Paul L. Doughty, and Harold D. Lasswell, *Peasants, Power and Applied Social Change: Vicos as a Model*,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1964, pp. 33–63.

② 美国新闻记者查尔斯·库拉尔特（Charles Kuralt）对维柯斯庄园的成功转让进行了报道，并拍摄了《如此，人人平等》的视频短片，经过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向观众播放。在短片中，康奈尔—秘鲁项目的研究人员被描述成维柯斯庄园中受压迫农奴的解放者，传递着美国人能够秉承崇高的精神帮助改造他国社会的坚定信念。参见 Deborah A. Wood, *Directed Cultural Change in Peru: A Guide to the Vicos Collection*,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Libraries, 1975, p. 54.

③ William W. Stein, “Reflexiones Críticas sobre el Proyecto Peru – Cornell”, en *Revista del Museo Nacional*, No. 48, 1986–1987, pp. 287–316.

柯斯土地所有权的转让更是受到以瓦拉斯公共慈善协会为代表的地主寡头集团的强烈抵制。不言而喻，仅仅一个康奈尔—秘鲁项目不能解开秘鲁沿海与内陆发展不平衡的困局，如果决策者不能有效地调整经济政策、推动土地的公平分配和保障边缘族群的权益，所谓的“土著人问题”就会一直持续下去。

五 结语

康奈尔—秘鲁项目是在美国自由国际主义战略框架下，由康奈尔大学与秘鲁土著研究所在秘鲁安第斯山区的维柯斯庄园合作实施的应用人类学实验项目。美国将使拉美地区保持在资本主义阵营视为“义不容辞”的“责任”，然而，20 世纪中叶以来安第斯山区的社会冲突愈演愈烈，暴力革命引起了美国的忧虑。霍姆伯格作为深受自由国际主义影响的人类学家，将自身的学术研究活动与国家政治利益紧密结合，谋求通过“发展”的方式避免农村社会的激进变革。在他的积极推动下，康奈尔—秘鲁项目从 1952 年开始在维柯斯庄园付诸实施并显现出一定成效：农业专业化生产提高了维柯斯的经济水平，义务教育和双语教学使土著人更好地融入外部世界，定期集会有效地调动了当地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然而，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随着古巴革命的胜利、肯尼迪政府对拉美政策的调整以及和平队志愿者的介入，维柯斯庄园的人类学实验陷入了冲突的漩涡，日渐失去了科学研究的底色。

康奈尔—秘鲁项目是自由国际主义与冷战时期的现实主义双重作用的产物。无论美国推出的“争取进步联盟”、和平队计划，还是本文探讨的人类学实验项目，从本质上讲，均服务于赢得冷战的政治目的。美国官方部门制定的发展计划是以本国社会发展进程为参照的，没有立足于拉美国家的社会现实，也没有真正地帮助其摆脱发展困境。时至今日，美国再次将拉美视为大国博弈的舞台并以发展援助为“筹码”，这足见其冷战思维之根深蒂固。

(责任编辑 黄 念)